

“Zomia”范式的政治人类学意义及其未来^①

金 杰

摘要：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一经出版即获得了学界的诸多关注，成为东南亚研究必读书目之一，但同时也受到学者们不同角度的批评。《逃避统治的艺术》重新定义了“Zomia”即东南亚山地的区域研究内涵，并指出二战前该区域内存在着一种山地居民为免于国家统治而从生计方式、政治结构、历史和宗教等方面建构的“逃避”机制。尽管我们可以指出斯科特使用史实的错误（如坚持“南诏傣族说”）或缺失，也可以批评他忽略了历史变迁的复杂性，但其研究的独到之处依然值得我们借鉴。从方法论来看，斯科特在长期消化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大胆提出理论假设，这是学术创新的必要路径。斯科特继承了利奇关于克钦人“贡萨”——“贡劳”社会结构的学术遗产，激进地建构了东南亚山地居民以“逃避”为核心的生存模式，堪称西方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的一次宏伟实验。“Zomia”研究范式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比如应该勇于跨越边界，从关系主义视角来考察研究对象。通过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比较研究，以交互性和流动性为中心考察其历史与当下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人文形态，探求新的知识生产格局，有望成为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作出新贡献的“民族志学术区”。最后，在“post-Zomia”时代，处于各民族国家包围下的山地族群如何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通过与国家部门和主流社会持续的遭遇、协商和妥协来寻求自身的发展空间，将会成为今后重要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东南亚高地；无政府主义；关系主义；民族志学术区；协商

作者简介：金杰（1990~），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泰国社会文化，澜沧江—湄公河水资源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仪式表演语境下中—缅—泰南传佛教诵经音乐比较研究”（18CD177）的阶段性成果。

^① 笔者在写作本文时，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博士生赵晔先生向我提供了今村真央的书评论文《東南アジア山地研究は地域研究として成り立つのか？》（东南亚山地研究能否成为区域研究？）的中译稿，在此，特表感谢！

一、引言：

耶鲁大学政治学兼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在2009年出版了《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以下简称《逃避统治的艺术》）。该书可以说是斯科特系列著作当中最气势恢宏且野心勃勃的一本。在这本书中，他要为东南亚高地的人民书写一段无国家的历史，也就是在他重新定义的“Zomia”区域，即包括了从越南中部高原到印度东北地区的所有海拔300米以上的地方，它包括了东南亚的5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以及中国的4个省区（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部分地区）。^①如果以中国中原王朝的持续存在为标尺，他认为那些远离国家中心的山地居民也同样大约拥有2000年的历史。这些山地居民的社会特性是“国家效应”影响的结果，他们主动选择逃离国家的统治，同时也防止内部国家机制的生成。本书出版后引发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赞誉，杜赞奇认为“这部著作可能是迄今为止詹姆斯·斯科特最重要的著作。^②它具有深入的洞察力、创造性和同情心。”当然，该书的出版也引起了诸多学者对其观点和论证的讨论和批评。^③

该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界的一件大事。尤其是对于区域研究来说，“Zomia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和一种新的地域研究思考方式”。^④本书的中译本已于2016年出版发行。对这类书籍的理解与评述是推进相关研究的基础工作，笔者将在下文中对《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先做内容上的介绍，然后针对该书的材料支撑和方法论等方面进行批评性讨论。

二、谷地国家与山地社会

在第一章中，斯科特指出在长期的国家建立和灭亡的过程中产生了边陲地区或者是碎裂地带（shatter zone），它的人口构成主要包括那些从国家中心地区逃离的人和那些从未被国家统治的人。而在不久之前还存在的世界上最大的无国家空间——也就是东南亚大陆山地，斯科特将它命名为“Zomia”。也就是说山地是一个无国家社会。山地社会和谷地国家有着鲜明的差别，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

^① 赞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三联书店2016年版，前言第1页。关于“Zomia”的地理范围可参见 Jean Michaud, “What's (written) history for?: On James C. Scott's Zomia, especially Chapter 6½”, *Anthropology Today*, 2017:1(33), 第6页地图。

^② 参见耶鲁大学出版社官网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评论，

^③ Charles Keyes, “Review of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010:1(37), pp237~242.

^④ 赞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前言第1页。

这个社会？斯科特认为山地居民的生存法则、社会组织、地理上的分散，以及他们文化中的许多因素都可以被理解为是被精心设计的，以阻止他们被统合进附近的国家，或者避免产生内部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换言之，他们是“国家效应”（state effect）的副产品，是“自我的野蛮化”。如此考量，那么社会进化的文明叙事就会彻底的崩溃。山地人不是“我们的活祖先”，把山地居民当做逃避谷地国家建设的人的后代可能更加准确。不是“文明难上山”，而是这些人为了逃避国家存在而主动选择的适应。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同时也是斯科特所强调的，山地与谷地的关系是辩证和共存的。正是在与周边国家的互动中，形成了2000年来“Zomia”无国家的历史。

基于国家中心的视角，斯科特首先转向理解东南亚大陆创造国家空间背后的逻辑与动力（第二、三、四章）。东南亚低地国家为了打造理想的“国家空间”，就必须持续地保有剩余劳动力和粮食。水稻种植一般都会成为国家空间的首选作物，因为尽管种植水稻的单位劳动力回报是比较低的，但却比旧世界任何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都要高。^①从国家征税的角度看，谷物方便统计与征收，同时也易于运输和收藏。所以，东南亚前现代国家的核心主要位于适合种植水稻的区域内，也就是河流下游的平原地区。水稻种植是一种劳动密集型农业，而1600年时东南亚大量土地上的居住的人口只有中国的七分之一，^②所以统治者更看重对人力的控制。在此意义上，长期存在于东南亚前现代国家的奴隶制有可能保障一个国家的繁荣。对于在战争中获胜的王国来说，把被俘获的人口强制搬迁居住于自己的国家空间之内，才是最重要的战利品。一方面，统治者用奴隶制来集中人口，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人口的流失。在斯科特看来，国家通过文明化的叙事把位于统治之外的人群污名化。在东南亚，文明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一套农业法则，未定居的，居住在山地的，不种植水稻的人群被定义为是原始的、落后的“野蛮人”，而低地国家则位居于文明的顶端。

在铺陈了低地国家通过粮食生产和人口集中来打造国家空间之后，斯科特开始进入到本书的重要部分——替位居低地国家坐标另一端的逃离国家的人群画像。斯科特发展了“地形阻力”（friction of terrians）的概念，也就是在地理层面上，东南亚大陆“山河相间，纵列分布”，多高山，少平原，坡陡谷深。对前现代国家而言，想要完全地征服边疆地带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相较之下，低地王国的文化、宇宙观以及轻便的商品等反而更能到达山地社会。正因此如此，“Zomia”地区千年来成为理想的避难区。那么，山地居民为什么要逃离国家空

① 赞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50页。

② 赞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72页。

间呢？斯科特的解释包括逐渐加重的税收和劳役，以及战争、饥荒、火灾和瘟疫等。他认为，这些因素造成人口从一个国家大规模迁移到另一个国家，从水稻核心区迁移到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区，以及山区人口的自我重新搬迁。^①

最后是该书的核心论证部分。斯科特从山地社会的农业生计方式、社会结构、口传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展开分析，目的是要论证这些实践更应该被视为对谷地国家的逃避，是一种政治上的策略选择。换句话说，山地居民们发挥了“策略阻力”。^②山地社会普遍的农业生计模式是游耕农业（shifting agriculture cultivation），辅以采集、狩猎做补充，被斯科特称为“逃跑农业”。游耕农业意味着在山地不同位置分散作业，可以种植多种作物，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从国家征收的角度看，山地作物不便于征收或者说征收成本很大，人口的征用也因为流动性而阻碍不小。因此，游耕这种农业技术的选择具有某种政治优势。再看所谓的“逃跑作物”，即是山地居民喜欢种植的马铃薯、粟、块茎作物（芋头、山药）等，它们的特性在于成熟期短且成熟时间不一，容易种植和看护，方便收获或者可以长时间保存于地下。从新世界引入并迅速普及的玉米、木薯等作物更是增加了山地作物的逃避价值——成熟快，能提供更高的热量，而且关键是在更高的地块生长，至少可以为山地居民再增加300米的活动空间。与之相关，山地社会形成了一种长期的“逃跑的社会结构”。一方面，在面临国家势力的统合和入侵时，山地居民采取的是社会重组的策略，也就是社会结构分裂为更小的社会单元，并进行重组，依赖地理的流动性来保持自身的独立。这里一个重要的基础是对资源的公共使用，借此“阻止财富和社会地位分化的扩大和持续”。^③斯科特以克伦人，以及利奇提出的贡老克钦等为例，指出山地社会存在的平等主义传统，他们选择分散、解体，而不被国家所统治。另一方面，山地社会存在一种“逃避文化”，也就是无文字和口述史的文化传统。也正因如此，山地居民才久久背负着“野蛮”的污名，因为文字与低地国家权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国家通过文字对臣民进行登记、收税，同时也通过文字、文本去建构共同的历史感和集体认同，形塑统治权力的正当性和社会等级的天然性。换言之，文字被用来作为国家治理的有效工具，而在国家之外的非臣民也很容易被描述为“野蛮的”、“未开化的”人群。与国家的书写传统相比较，口头传统在弹性和适应性方面有着更好的优势。对于山地族群来说，口述传统反而更有利于适应反复无常和充满政治危险的环境，趋向自由与独立的空间。谷地国家的文明叙事中当然少不了各

① 赞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198页。

② 赞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236页。

③ 赞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258页。

类宗教所提供的世界观、宇宙观，同样，山地社会诸族群也都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与宇宙观（一般不同于低地宗教）——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历史交往过程中与谷地意识形态的互动与借鉴。山地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广泛存在的千年信仰传统，斯科特把它看做是“较高阶段的逃避社会结构”。^①基于以上论述，斯科特完成了他对山地社会是“国家效应”的核心论点的论证，即山地居民是“作为有国家的政治环境中的非臣民的存在。”^②

三、材料支撑与阐释之疑

斯科特要处理的“Zomia”——逃离者的避难所或者碎裂带（shatter zone）——的区域面积达250万平方公里，居住着1亿少数族群。要书写该区域山地居民2000年来不断抵抗国家的历史，其空间之广阔、历史之纵深可以说是让很多学者产生了畏难情绪，因此，斯科特的研究是比较少见的，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文明研究算是同一类型的研究。一方面，我们看到斯科特作为学者开拓新的研究视角的非凡勇气以及积10年之功梳理历史文献、民族志材料的坚毅性格，另一方面，我们也深感该区域内部复杂性与多样性给他的研究所带来的重重困难。

斯科特主张高地社会是“国家效应”的产物，在第五章叙述Zomia人口在历史长河中缓慢增加的过程及其原因时，斯科特很倚重中国古代史的材料。他认为，很大部分山地居民源于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的从北向南的扩张过程中引发的人口迁移。“中原王朝在差不多2000年中对Zomia的压力就是一个将人口推向山地的单一历史过程，尽管这一压力时有时无，但却总是朝向一个方向。”^③具体而言，他以当今最显赫的族群——傣泰^④作为被迫向西或西南的Zomia山地迁移的文化和人群中的代表。“他们最大的创造国家的努力是在云南建立了南诏王国和其后继者大理王国（737~1153），他们击败了唐朝的入侵，并一度控制了四川首府。在被蒙古入侵破坏之前，这一权力中心已经征服了缅甸中部的骠王国，并扩展到泰国北部和老挝。蒙古的胜利导致东南亚高地及其周边地区的进一步瓦解。”^⑤当下，学界对泛泰族群的语言社区包括泰族和低地的佬族、缅甸的掸族、中国西南的壮族以及从越南北方直到印度阿萨姆邦的各种相关族群都没有太多争议。但从斯科特的上述论述中看出，他认为傣泰族群面对中原王朝的扩张不

① 赞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390页。

② 赞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418页。

③ 赞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171、170、469页。

④ 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中文翻译有所更改。

⑤ 贺圣达：《“南诏傣族王国说”的由来与破产》，《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第212~213页。

断向西南或南方迁徙，其势力范围还一度扩展到了泰国北部和老挝。然而，事实是否如此呢？还是说斯科特过度发挥了他所谓的“国家效应”？

在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回顾一下在傣泰族群起源问题中的“南诏泰族王国说”这一百年公案。“南诏泰族王国说”滥觞于英国伦敦大学教授T·D·拉古伯利。他在为A·R·科胡恩所著的《在掸人中》一书所写的绪论中提出，南诏国由泰族建立，直到被蒙古人征服。贺圣达认为拉古伯利在基本事实尚未搞清楚的情况下臆造出了“南诏泰族王国说”。^①后来美国传教士W·C·杜德出版了《泰族》（1923年），曾长期担任英国驻清迈领事的W·A·R·伍德出版了《暹罗史》（1925年）。他们依然把南诏史嫁接到泰国或泰族古代史上。《泰族》于1932年被译成泰文，在泰国流传甚广。《暹罗史》是第一部用英文写成的泰国史，其古代部分集拉古伯利以来西方学者观点之大成而加以系统化，后来在英语世界也有广泛的影响，许多东南亚史著作转述的“南诏泰族王国说”往往都采用了伍德的說法。经过伍德等学者的著述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这一谬误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成为流行世界的说法，在泰国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历史观。1978年，中国学者杜玉亭和陈吕范合写的《忽必烈平大理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一文用大量确凿的史识，论证了忽必烈平大理国并没有引起任何民族大迁移，同时还提出泰族先民起源于中南半岛南部的观点。该文很快被泰国有识之士翻译成英文、泰文，这对泰国学者重新反思南诏与泰族起源问题以及反思和批判西方学界“南诏泰族王国说”都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81年，美国学者查尔斯·巴克斯（Charlers Backus）的《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一书根据大量中国文献资料和当代历史学、民族学研究成果，详尽地分析和考证了南诏基本居民的民族特质和文化特征，指出“没有任何一点语言上的证据，可以支持南诏的居民与今天的泰族有关的理论”，“在汉文资料中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关于泰族大规模迁移的假说”，“一个至今尚存的文化特点（指“父子连名制”）证明南诏民族不可能与泰族有关。”他的结论是：“南诏国的主要居民属于藏缅语系的民族。”^②1982年，美国著名的泰国史专家康纳尔大学教授大卫·怀亚特（David K. Wyatt）出版了《泰国史》，他在书中已经完全认为没有证据再支持南诏是泰族国家的结论。^③

总之，“南诏泰族王国说”早已在学理上宣告破产。但奇怪的是，斯科特在本书的参考文献里都提及了上述两本西方学者的著作，而且他还提到自巴克斯

① 贺圣达：《“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由来与破产》，《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第212~213页。

② 查尔斯·巴克斯著，林超民译：《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1~52页。

③ 戴维·K·怀亚特著，郭继光译：《泰国史》，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10~13页。

的著作发表以后，（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关于南诏“泰族特性”的广泛争论。^①笔者由此判断，如果不是他没有阅读以上两本文献（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很小的），那么就是他为了坚持其论点而对事实进行了选择性甚至简略化的阐释。首先，他忽略了“傣泰族群”漫长且复杂的演化与建立政权的历史过程，并且把他们过于同质化，以凸显其人口移动的“单向性”论断。同样，他的“国家”模型似乎是跨域时间与文化的均质化存在。这和东南亚大陆历史上存在的国家类型并不相符，比如说，原始时期的扶南王国，印度化的吴哥王朝，汉化的越南王朝，佛教王国勃固、阿瑜陀耶等以及殖民时期的缅甸和“印度支那”。^②斯科特把诸多国家类型都置于一种水稻国家模式之下，难免会忽视其间的重要差异。所以，笔者赞同杜树海的看法，单从“Zomia”的中国部分来看，几千年来一直面对强大的中原帝国及其从未间断的独特文明，在这一点上与其他地区颇为不同。^③中国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与中原帝国的互动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这为后继者去发展出不同的理论与解释模式留有空间。

此外，我们能明显感受到斯科特的这本著作深受利奇的影响。他在书中直言：“任何走我所走过的这条路的人都要靠不断地参阅爱德蒙·利奇的《缅甸高地的政治体系》，才能有所成就。很少有著作这么‘值得深入思考的’。”^④他在论述山地社会整体上是民主式的平权结构时，对利奇的克钦研究结果多有借鉴，对族群性的激进的建构主义阐释可以说也是在利奇的基础上推进的。从他理解并使用利奇的成果来看，斯科特的论证依然存在简单化的问题。对于利奇的克钦研究，正如斯科特所言，在《东南亚高地的社会动态：对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的再思考》（*Social Dynamics in the Highlands of Southeast Asia: Reconsidering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by Edmund Leach）一书中，当代民族志学者对他的贡献做了彻底的批判性考察。莱曼（F.K. Lehman）指出：对于利奇的功劳而言，它其实表达了自封的山官的意思，“因为贡是一个表达尊敬的前缀，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被用在动词中，否则就是说话者实际上正在明确宣称自己的贵族地位，并希望得到理解！”“人们可以把这类领袖称为贡劳督或者贡劳木甘，即

^①Charles Keyes, “Review of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pp237~242.

^②Charles Keyes, “Review of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pp237~242.

^③杜树海：《山民与国家之间——詹姆斯·斯科特的佐米亚研究及其批评》，《世界民族》，2014年第2期，第103页。

^④赞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7页。

‘贡劳山官’。”^①尽管斯科特已经注意到这些批评，但他依然肯定了利奇提供的克钦贡劳模式，认为这样一种民主式的社会组织结构符合他所理解的“逃避的社会结构”，只不过二者在解释上略有差异。利奇认为“贡劳”模式不甚稳定，一旦头领逐渐想固化其等级地位与权威时，很可能会从内部爆发叛乱。而斯科特却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他认为出于山地的流动性，是逃跑而不是叛乱维持了山地社会的自由和平等主义，因此也就抵制了内部的等级制度和外部的国家的形成。可见，斯科特把“贡劳模式”推到了更加激进的平等主义上。有学者认为利奇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有意忽视了大量政治和经济变迁（特别是英帝国统治和鸦片经济）对克钦社会组织的影响。^②笔者认为，这一批评同样适用于斯科特自身。晚近的几个世纪以来，在东南亚大陆高地区域的鸦片经济等可以说是形塑该区域政治经济特征的重要因素，但斯科特也仅是简单提及山地与谷底国家间有双向的贸易往来而做出简化处理。这里的一个质疑就是，山地族群难道没有内生的社会等级与权力阶序么？鸦片经济模式是否会对山地族群的政治组织模式产生影响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何翠萍等提出的未来需要进一步“处理高地Zomia及周边国家之间的贸易活动”和研究“Zomia地区中贸易和社群形成之间的关系”则是非常必要的。^③肖坤冰探讨清代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围绕普洱茶贸易与族群关系的研究是个很好的例证。她指出，云南边疆高地社会的形塑与整合与中原形成的紧密的经济联系（物质贸易）有着重要的关联，所以长久的商贸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④

四、方法论之争

关于东南亚大陆山地的研究，日本学界有着较深厚的积累。^⑤《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的日译本在2013年出版后受到了广泛关注，日本学者对斯科特在书中提出的大胆假设多有赞誉。2014年，日本学界出版了由克里斯蒂安·丹尼尔（Christian Daniels）编著的《东南亚大陆——山地民的历史与文化》（以下简称

^① 埃德蒙·R·利奇著，杨春宇、周歆红译：《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代译序第5页。

^② David Nugent, "Closed Systems and Contradiction: The Kachin In and Out of History." *Man*, 1982: 3(17), pp508~527.

^③ 何翠萍、魏捷兹、黄淑莉：《论 James Scott 高地东南亚新命名 Zomia 的意义与未来》，《历史人类学学刊》，2011年第1期，第77~100页。

^④ 肖坤冰：《从“高地”到“低地”——从“佐米亚”概念看清代云南边境的普洱茶贸易与族群互动》，《民俗研究》，2018年第2期，第57~66页。

^⑤ 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是日本东南亚区域研究的重镇，对东南亚地区的研究已有50年之积累。具体历史沿革与发展参见其官网：<https://history.cseas.kyoto-u.ac.jp/>。

《东南亚大陆》），该书汇集了日本学者关于该地区多民族集团的八篇主题新颖多元的研究论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今村真央认为，该书总体上显示了日本东南亚研究的高度与广度。该论文集所要对话的对象就是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通过管窥日本学者的他山之石，也许可以更好地激发国内学界对“Zomia”研究的讨论与吸收。

《东南亚大陆》一书的编者丹吉尔斯早先就撰写过书评批评斯科特的Zomia历史叙述是类推式想象多于史料的支撑。在该书的序论中，他针对斯科特的做法评论到：“可惜史料运用方法上问题颇多，未脱假设的范畴”。^①两本书似乎在诸多方面存在对立。斯科特更多地主张山地与盆地的对立关系，而《东南亚大陆》的作者们更主张通过细致的田野调查指出山地与谷底的相互依存与共性等共存要素。更主要的对立还是在于方法论上。斯科特批评以往的区域研究局限于民族国家框架以及较小的空间范围，也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以他重新定义了“Zomia”，探索了一个新的“地区研究”，实现了一种对历史的共通性的理解。与此相对，《东南亚大陆》的作者们“从特定地区或民族集团的历史体验出发，以个案讨论山地居民的历史，而非刻意地构筑‘共通的历史’。”^②也就是说，他们对寻求山地文化历史共通性的路径持否定态度。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的区域研究学者持较为克制的态度，并且强于坚实的个案积累。也就是说，日本学者重视熟练掌握当地语言，精研史料，坚持走规范的民族志调查路径积累坚实的数据资料。在扎实的个案积累方面，日本学者的态度确实让人敬佩。例如，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留下的“满铁调查”资料，从学术价值角度看，依然是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十分珍贵且有待充分利用的参考资料。^③

《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最引人入胜的，也许就是斯科特提出的新颖明快的观点，这也许属于未被充分证实的假说。与之相类似的，缅甸史大家维克多·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在《形异神似：全球背景下的东南亚（约800~1830年）》（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一书中也提出了宏大的假说。李伯曼认为，“记录与理论的关系是经常相互对话的关系，并不应将其中一

① 今村真央：《東南アジア山地研究は地域研究として成り立つのか？》（东南亚山地研究能否成为区域研究？），《東南アジア研究》（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2期，第279~286页。

② 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是日本东南亚区域研究的重镇，对东南亚地区的研究已有50年之积累。具体历史沿革与发展参见其官网：<https://history.cseas.kyoto-u.ac.jp/>。

③ 刘正爱指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满铁调查，为后来的汉人社会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刘正爱：《浅谈日本人类学在中国大陆的影响——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中心》，《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第155页）。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牵头编译的《满铁调查》中文版第一辑已经面世，其余译本也会陆续推出。

方作为先决条件……”，不是说事实积累之后假说就会自然产生。假说有助于“从大量数据资料中找寻特定历史模式”，^①同时也有助于发现新的史料。落实到区域研究，到底该如何看待假说与实证，如何把握树木与森林的关系？从知识演进的角度看，二者似乎并不存在对立，而是研究过程中经常互相交织的自然过程。我们既要通过扎实的经验研究进行抽象化，普遍化，上升到一般性的理论，同样也需要在梳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提出理论假说，以指导我们更好地把握纷繁复杂的经验现象。个中差异可能还是取决于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及其学术传统、方法论抉择。通过比较和消化不同风格的治学方法，对我们增进假说与实证之间关系的体悟无疑会大有裨益，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也许可以期待《东南亚大陆》一书的中译本早日问世。

五、结语

对《逃避统治的艺术》而言，尽管我们可以从细节方面指摘斯科特的错误，甚至可以对他的论证过程提出批评，但必须承认的是该书在确立研究对象，采用新的研究视角等方面都给予了我们诸多的启发，是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者不可绕过的必读书目。

笔者首先想从政治人类学学科史的角度来定位该书的贡献。学界的共识认为1940年出版的《非洲政治制度》一书标志着政治人类学领域的确立。在大量田野材料的基础之上，作者们总结出了非洲社会的两种政治制度模式，即原始国家（primitive states）和无国家社会（stateless societies）。^②其核心的关注就是无国家社会的政治秩序为什么能够一直延续下来？埃文斯-普理查德的《努尔人》一书可谓是给出了经典的回答。他通过分析努尔人的裂变分支体系（the segentary lineage system），指出其对于社会的平衡与统合的重要意义。^③之后，埃德蒙·R·利奇的《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一书通过对缅甸高地克钦社会及其他族群之关系的研究构建出“贡萨”（等级制）—“贡劳”（平等制）这一“理念类型”，指出克钦社会政治组织模式摇摆于等级制和平等制之间。利奇的突破在于从东南亚山地多族群社会中提出了所谓的“动态平衡”模式。对于无国家/非等级制社会秩序的追问依然是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的核心问题，只是他把考察的时空范围极大地扩展到大陆东南亚山地以及2000年的历史长河当

^① 赞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47页。

^② M·福蒂斯，埃文思-普理查德编，刘真译：《非洲的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③ 埃文思-普理查德著，褚建芳译：《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中。斯科特通过“谷地国家”与“山地社会”既联系又相互对立的“理念型”建构（可以视为对利奇“钟摆模式”的一种继承），赋予了“Zomia”群体充分的政治能动性，论证了“这些人群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组织都是为了逃避被统合到国家结构中而做出的策略性适应。”^①也就是说，在国家这类制度性政治结构缺位的地方，并不是无序的世界。对山地社会而言，政治秩序的基本单位是核心家庭、世系制度、村庄等。这类“逃避的社会结构”发挥了“国家”的功能。质言之，斯科特从非国家中心的视角，为处于统治和税收之外的“高地社会”写就了一部无国家的历史，这是一次对长久以来以国家一定居农业—文字为核心的文明史观的彻底的颠覆与反动，可以说该书“浸透了西方经典所焦虑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的精华”。^②

其次，斯科特开创了“区域研究”的新范式——“Zomia”。这一范式对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该以一种关系主义的视角去看待所研究的对象，并鼓励我们开展类似跨越边界（国界）的实验。在广阔的“Zomia”区域内，中国西南地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处于东南亚与中国的中间地带，从历史上看，在中国与东南亚的政商关系中，西南地区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中国西南地区在古代中国—印度文明的谱系关系中也起着中介纽带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西南不仅仅是现代国家的边疆地区，它同样也具有区域性世界的重要内涵。基于当前人类学和民族学界在西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③我们应该继续推进“区域研究”，把中国西南与大陆东南亚—南亚结合起来，以交互性和流动性为中心考察其历史和当下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人文形态。这有利于我们跨越边界，重新恢复区域内的各族群长期互动与交往的样貌，在更广阔的区域范围内检视既有的人类学理论范式，探求新的知识生产格局，使之成为有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贡献的

① 赞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44页。

② 李伟华：《政治秩序的中层理论》，《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19期。

③ 张原指出，在经历了“区域模式”、“族群模式”和“跨境模式”等研究范式后，西南研究形成了基于“走廊”学说和“通道”研究而展开的“区域模式”。王铭铭、舒瑜等基于新世纪西南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提炼出“文化复合性”概念。参见张原：《“走廊”与“通道”：中国西南区域研究的人类学再构思》，《民族学刊》2014年第4期。王铭铭、舒瑜：《跨越边界与范式——《文化复合性：西南的仪式、人物与交换》导论》，《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民族志学术区”。^①这一学术实践同时也具备重大的现实意义，即为“一带一路”建设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互联互通提供坚实的社会文化认知基础。

最后，笔者想就“Post-Zomia”（后佐米亚）时代研究的前景做一些探讨。斯科特已经提醒我们，他的分析可能不适用于20世纪后期的东南亚。^②因为自1945年或者更早时期以来，各个国家通过各种现代技术已经克服了地形阻力，把权力伸展到最边远的边界，将那些弱者或尚未被统治的区域清扫收编。^③也就是说作为非国家空间的“Zomia”事实上已经被各民族国家纳入版图中，山地居民自此遭遇的是帝国持续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以及应对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各种挑战。在“逃避”模式和“同化”^④模式之外，当下直接面对国家权力的山地居民的未来又将如何？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山地人尝试有尊严的被纳入到民族国家版图当中，即不需要脱离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就可以获得完整的公民权。^⑤但来自主流社会的视山地居民为野蛮、落后之他者的刻板印象或偏见，并不会随着民族国家建构的深化而轻易的消失，山地居民势必要在当下的社会发展大背景下通过与国家主体的协商与妥协、与社会各界互动理解的基础上去寻求发展的空间与机遇。

泰国北部山地族群的遭遇，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例证。近30年来，泰国北部山地族群所面对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与发展的危机来自于1985年泰国林业管理部门为应对国家森林面积急剧下降而出台的森林保护政策，即国家森林面积要保持在40%的水平线上，其中保护林占15%，经济林占25%。^⑥在保护林范围内生活的

① 王铭铭在《文化复合型：西南的仪式、人物、与交换》导论中探讨了西南研究作为“民族志学术区”的意义和潜力，他指出，王筑生用云南景颇研究与基于东南亚经验的政治人类学经典理论对话的方式值得多加重视。参见王铭铭、舒瑜：《跨越边界与范式——《文化复合性：西南的仪式、人物与交换》导论》，《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35页及注释9。笔者以为，在斯科特的“Zomia”视阈中，中国西南地区 and 东南亚高地的社会、政治、文化特征具有较强相似性，因此可以视之为一个更大的“民族志学术区”，通过对经典人类学理论的再研究或者比较研究，对我国人类学界海外东南亚研究和西南研究将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② 如郑少雄所言，物质技术的改变并不意味着观念的相应剧变。参见郑少雄：《把寺庙搬下山：在直接互动中获得社会空间——对斯科特的一个补足性反思》，《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第98页。山地居民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相较于生计模式、居住格局和社会组织而言，其变迁速率更趋缓慢和隐性，曾经的思想资源未尝不会在当代情境下回荡。

③ 赞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前言第5页。

④ 郑少雄：《把寺庙搬下山：在直接互动中获得社会空间——对斯科特的一个补足性反思》，《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第97页。

⑤ Bernard Formoso, “Zomian or zombies? What future exists for the peopl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Massif?”,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2010(5), p323.

⑥ Praphat Pintoptaeng, “Politics on the Street: 99 Days of the Assembly of the Poor, Bangkok: Krirk University, 1998.

群体必须迁出。对泰北山地居民而言，森林不仅仅是获取生存资料的来源地，还是他们的道德与信仰的实践空间，是他们共同的家园。1989年，泰北山区某村民与一个从林业部门租用森林的私人公司发生了冲突，村民奋起维护森林资源的权利。这一冲突促成了“社区森林”（community forestry）概念的诞生，并且引发了一场针对社区森林资源管理与利用的社会大讨论，也即长达近30年的社区森林法案倡导运动。^①泰北山地居民与知识分子，NGO群体等其他社会部门逐渐联合起来，进行了漫长的社会抗争，他们的核心诉求是认为山地居民有权利参与到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当中，国家应该认识到山地居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地方性习俗与信仰实践在现实中的约束力，并且以法律的方式承认其社区权利。《社区森林法案》的“民间版本”就是这一努力的体现。虽然《社区森林法案》最终并没有获得通过，但是有关管理部门已经部分地接受了“社区森林”的理念，有限度地允许村民参与保护区的管理。这不得不说是泰国少数民族与民间社会取得的重大进步。我们可以看出，在与国家权力的对抗和协商过程中，山地族群、NGO和知识群体不断深化和创造出对于公民权利的新理解。^②

质言之，在后佐米亚时代，山地民已经不再是逃避国家统治的人，但也不是所谓的“僵化的人”。^③在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背景下，边境贸易、旅游、国际发展计划、宗教的跨国传播网络等诸多条件，都将会持续影响山地居民与主流社会的互动与关系建构，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山地族群的未来，依然是学者们的关注要点。

[责任编辑：王国平]

① 龚浩群：《社会变动之林：当代泰国公民身份的重构》，《开放时代》，2014年第3期，第181~197页。Anan Ganjanapan, “Local Control of Land and Forest: Cultural Dimensions of Resource Management in Northern Thailand”. Regional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RCSD),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 Bangkok: Chiang Mai University,2000.

② 龚浩群：《社会变动之林：当地泰国公民身份的重构》，第194页。

③ Bernard Formoso, “Zomian or zombies? What future exists for the peopl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Massif?” ,p313.